

北大 文章

Beidawenzhang Yongliuchuan

永流传

傅斯年

蔡元培

李大钊

严复

陈独秀

王国维

徐志摩

鲁迅

朱自清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BROADCASTING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我以为所谓的北大文章应当是大气的、有高度的、兼容并包的，
是有关注民族国家乃至全社会、全人类的大襟怀的，是对应于中国
知识分子几千年以来一脉相承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
北大文章应当是有锐气、有风骨、有人文关怀的，是勇于向腐朽落后的东西
发起凌厉的进攻的，是勇于挺身而出捍卫真理、科学与正义且不怕牺牲的

◎ 朱家雄 编



北大文章

Bidaenzhang Yongliuchuan

朱家雄 编

永流传

蔡元培

陈独秀

王国维

徐志摩

傅斯年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朱自清

（封面设计：陈鹤良）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大文章永流传/朱家雄编.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6. 10

ISBN 7-5043-5055-9

I. 北... II. 朱... III. 杂文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0545 号

北大文章永流传

编 者	朱家雄
责任编辑	景 辉
封面设计	张 颀
责任校对	张莲芳
监 印	陈晓华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86093580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 (邮政编码 10004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京南印刷厂
装 订	涿州市新华装订厂
开 本	680 毫米×980 毫米 1/16
字 数	226 (千) 字
印 张	15. 75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书 号	ISBN 7-5043-5055-9/I · 676
定 价	29. 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 朱家雄 ※

北大文章永流传

北大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登场亮相，自然是以1898年百日维新中光绪帝下旨开办京师大学堂为起始。但若说到北大在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则必然的非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那一激动人心的时期莫属。想当年，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中华民国虽然在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丧钟声中艰难地矗立起来了，京师大学堂也随之改称为“北京大学”了，可在随后的若干年里，巨大的黑暗仍然笼罩在广大的国土上，因袭的创伤与重负，现实中无比憋闷无比污浊的空气，使世纪初年的中国仍然举步维艰。

所幸的是，在沉闷的空气中，一批可称之为启蒙思想家的人物登高而呼了！这一群人，就是围绕在北大校长蔡元培身边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刘半农、钱玄同、傅斯年、罗家伦、邓中夏等，以及王国维、辜鸿铭、杨昌济、蒋梦麟、马寅初、梁漱溟、张竞生、郁达夫、朱自清、徐志摩、俞平伯、顾颉刚、茅盾，等等，他们意气风发、叱咤风云，他们畅快淋漓地鞭挞着旧秩序、旧堡垒、旧文化，他们奋力把古旧的中国推向新生的彼岸，他们把火把与光亮引进了他们所置身的时代，他们把绿树和希望植满了荒凉的视野，他们是国家进步、民众解放的功臣，他们的思想光辉、革新精神包括他们的学术思考、人生理念无不照亮了20世纪初期沉寂与昏睡的中国，他们写下的大量的或理性、沉静的，或激越、战斗的文字业已成为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许多年后，当我们在新世纪的今天重又展读起他们的文章，这个范围其实并不局限于北大人，从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从孙中山、严复、马相伯到邹容、陈天华、秋瑾、黄兴，从毛泽东、瞿秋

白、恽代英到闻一多、郭沫若、沈从文、巴金等众多思想者的文字，哪怕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比如诸北大先贤们的激扬文字，我们的心情也不能不激动，甚至我们的心海里还会掀起巨大的波澜。我们不禁要问自己，为什么他们的文字这样刚健有力？这样振聋发聩？这样沉雄勇猛？这样爱憎鲜明？这样沉静温情？这样驳杂丰富？这样的文字为什么在今天难以产生也难以读到？显然，这是有原因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字，这些产生于国衰民弱年代的文字自然与国家的命运有关，与国家承负的苦难有关。

自鸦片战争始，整个19世纪后半期，直至20世纪上半叶，在长逾百年的历程中，我们的国家可谓饱经忧患，遍体创伤，唉，一个有着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东方古国，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竟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割地赔款。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之败，八国联军，抗日战争……一块块国土被割让了，无数的财富被劫掠了，一次次灾难俯罩在这片土地上，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蛮横地烙进了这伟大古国的肌体里。近代之中国，何其颓丧！何其窝囊！近代之国人，又当何其沉痛！何其郁怒！基于此，我们甚至可以说，生于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实在是很不幸的。

所幸的是，一批生于那个年代的有识之士、有志之士、有为之士是清醒、觉悟而勇毅的，他们在历史的烟尘中前仆后继地向晚生的我们走来，向着我们多姿多彩的瞳孔中走来，他们是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们，他们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们，他们是孙中山、黄兴、蔡锷们，他们是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们，他们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们……正是这些民族英雄和革命志士，为挺起国家的脊梁，为打破历史的铁幕，为冲决衰败的王朝，为呼唤黎明的曙光，或浴血战斗乃至为国捐躯，或奔走疾呼掀起维新的风云，或数十年努力不懈革命不止……

二

比较而言，安身于今日、立命于当世的中国人则幸运得多了，不是吗？经济蓬勃发展，老百姓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只要你在人堆里混得也还马马虎虎，就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只是不知今日之中国人，究竟有多少是有意识地在珍惜着今日的生活的，或者他们只顾营建着自己的安乐，并没有去想这么多，也无暇去想那么多。我们所能感

知的乃是,如果先辈们有知,则他们是一定要羡慕今日的幸福生活的。想当年,我们的先辈承受了多少残酷的阵痛又沐浴了多少血雨腥风啊!这一切,当是我们今日之中国人所不能忘记的,即便从小沐浴着阳光雨露,即使我们神州大地花红柳绿四季如春,我们的心中就当警钟长鸣,也当如国歌里所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那样一刻也不能懈怠。何况,今日之中国虽早已是扬眉吐气、昂然屹立在世界东方的大国,但在变幻莫测的国际舞台上,却仍然免不了会在一些时候感到困扰和艰难,并且我们的国家还有着这样那样的许多问题有待大家去努力解决,“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提醒于我们的乃是,不论是在战乱年代还是和平年代,忧患意识都同样重要,和平安泰的生活当然是人类的追求,和谐、幸福的好日子也当然是我们所要拥抱的,但贪图享乐、耽于安逸在任何时候却也是我们每一个国民都要有所警惕的。

今天的我们是不该也无法忘记已经远去了的那些记载于历史书上的苦难的,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一百年里,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和我们可不一样,他们离苦难显然比较的近,甚至很近,乃至就置身在现实的苦难之中。情形若此,倘先辈们还不奋起,不抗争,不呐喊,不革命,则国必将不国,则我中华民族必难有今日之兴,则今日的民众必不能享受美好的生活。正是因为苦难深重、风急雨暴的时代有无数英雄人物为我中华之崛起而努力奋争,才有今日无数平民百姓的惬意人生。因此,当我们在春风里、暖阳下享受着社会发展带给我们的舒适时,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可以轻易地忘记那过去了的风起云涌、烟尘滚滚的革命年代?还有那英勇无畏的无数战士?以及那集大智慧与超人胆识于一身的先辈英才们?

三

所谓北大文章,自然是北大人所写的文章,并且是其中当之无愧的那一部分;就本书的选编来说,自然是有着较鲜明的倾向的,这在根本上是取决于诸位北大先贤所置身的时代以及他们自身的风骨的。就本书内容而言,我以为所谓的北大文章应当是大气的、有高度的、兼容并包的,是有关民族国家乃至全社会、全人类的大襟怀的,是对应于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以来一脉相承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北大文章应当是有锐气、有风骨,

有人文关怀的,是勇于向腐朽落后的东西发起凌厉的进攻的,是勇于挺身而出捍卫真理、科学与正义且不怕牺牲的;北大文章应当是扎实而深邃的,是无畏、机智而思想的,是沉潜到广大民众的底部以及文化的内部进行了全方位的体验并为之说话的,是深入到社会结构的各个环节和细部进行多角度的观察并指出其问题的;如果再结合一下北大自身的传统和当今时代的形势,则我以为还可以说,北大文章应当是充满激情而又智慧、严谨、理性的,北大文章是敢为天下先的,是与时俱进的,是能够代表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的方向的,是能够激扬起民众的热情且使之辽阔地奔腾的。

这样的文章,是北大人理想、智慧、情感、心血与才华的结晶,是北大乃至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同时,也是北大与北大人对社会做出的永载史册的一大贡献。在北大自建校至今逾百年的历史进程中,涌现了多少杰出乃至伟大的北大人啊,而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在各个历史时期又曾奋笔写下多少振奋人心的“北大文章”啊!可以说,这些文章,是北大人永远的光荣与骄傲,永远的勋章与灯塔。

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我经常性地去图书馆查找、阅读这些“北大文章”,本书所收的文字显然并没有囊括所有的北大先贤,也不一定是按作者的重要性来决定收与不收、收多收少,因为篇幅所限,收入的也仅仅是海量的“北大文章”中的很小一部分,还因为部分作者的版权问题无从解决包括像胡适、马寅初、梁漱溟、蒋梦麟、张竞生、俞平伯、梁实秋、林语堂、罗家伦、沈从文、顾颉刚、冯友兰、陈寅恪、汤用彤、金岳霖、朱光潜、王力、费孝通、张岱年、张中行、季羨林、邓广铭、侯仁之等一大批大师级学者的文章也都没有收入,但我想这并不影响本书的分量,我希望本书所收入的,乃是可以代表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北大文章”当中最主体、最精彩的一部分,乃至与我预设的目标无限接近。这些最有血性的文字,或激越,或郁怒,或沉静,或温情,其间凝聚着深沉宽厚的对国家、对民族、对文化、对人民的爱,这是现代中国最有风骨的思想家、革命家、作家、学者中的一批代表所写下的经典篇章。今天,当我们读到它们——这些酣畅淋漓、阳刚大气、振聋发聩的文字,这些涨满了爱国精神、抗争勇气和无所畏惧的文字,这些传承文明、光照神州、温暖人间的文字,应该说,我们是为这些文字的存在而倍感欣幸的。我们从内心里对这些文字以及他们的作者充满了感谢和敬意,因为我们从中获得了激情和力

量,乃至可以在纷繁而浮躁的现实中更为沉潜、奋然地前行。

收入本书的文章,乃是诸多北大先贤所写文字的一部分,这些先辈英才自然是我们所要记住的,而他们的文字,也是要永远地流传下去的,只愿我所编的这一册书能为今天的读者架起一座通往诸位先贤思想深处、心灵深处的桥梁。



北大文章永流传 朱家雄/1

蔡元培/1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2 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纪念/9 现代学生的
三个基本条件/10 中国新教育的趋势/14 《北京大学月刊》发刊
词/17 墨子/19 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23

严 复/28

原败/29

杨昌济/36

劝学篇/37 余改良社会之意见/42 告学生/47

王国维/50

文学小言/51 屈子文学之精神/55 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
之学问/58

辜鸿铭/62

东西异同论/63

吴稚晖/70

青年与工具/71

沈兼士/76

儿童公育/77

陈独秀/81

人生真义/82 新青年/85 《新青年》宣言/88 文学革命论/90
蔡子民先生逝世后感言/93

李大钊/95

现在与将来/96 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98 庶民的胜利/102
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104

邓中夏/106

我们为什么出版这个《劳动音》呢? /107

刘师培/109

论激烈的好处/110

刘半农/113

北大河/114 我的求学经过及将来工作/118 关于外国话及外国字/120

钱玄同/124

共和纪年说/125 青年与古书/129 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迁升之喜并祝进步/132

鲁迅/135

论“他妈的!”/136 我之节烈观/139 说胡须/146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150

朱自清/155

执政府大屠杀记/156 北平沦陷那一天/162 论不满现状/164
正义/167 大学的路/170 论轰炸/172

徐志摩/174

“迎上前去”/175 “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179

郁达夫/181

中国人的出路/182 世界动态与中国/185 政治与军事/188

日本思想的中心/190 空袭闲谈/195 抗战两年来的军事/198

美国对远东及轴心国的态度/201 十年教训/203

许寿裳/206

归国在杭州教书/207 杂谈著作/209

丁文江/212

一个外国朋友对于一个留学生的忠告/213 现在中国的中年与

青年/219 假如我是张学良/223

傅斯年/225

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226 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231 我所

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236

❖ 蔡元培 ❖

作者小传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子民,绍兴人。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23岁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后授编修。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蔡元培认定清廷政治改良无望,毅然弃官离京南归,开始委身教育。先后执长绍郡中西学堂、嵊县剡山书院、上海澄衷学堂南洋公学特班,创办爱国女校、爱国学社,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1912年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7年起任北京大学校长凡11年(实际在职六年半)。1927年后历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监察院院长兼司法部代部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7年冬上海沦陷后移居香港。1940年3月在香港病逝。毛泽东主席特致唁电,称蔡元培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所著后人辑为《蔡元培全集》。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

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民国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为京师大学堂,包有师范馆、仕学馆等,而译学馆亦为其一部。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是为我在北大服务之第一次。

民国元年,我长教育部,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一、大学设法、商等科的,必设文科;设医、农、工等科的,必设理科。二、大学应设大学院(即今研究院),为教授、留校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三、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外,再筹办大学各一所于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尔时想不到后来各省均有办大学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学堂,本仿日本制,为大学预备科,但程度不齐,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乃废止高等学堂,于大学中设预科。(此点后来为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难。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堂,就没有一个荟萃较高学者的机关,文化不免落后;但自各省竞设大学后,就不必顾虑了。)

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侯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叔权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

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能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的，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止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信

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为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而来校既久,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了阑珊起来。我们斟酌了一番,辞退几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的。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习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我从前在教育部时,为了各省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故改为各大学直接的预科。不意北大的预科,因历年校长的放任与预科学长的误会,竟演成独立的状态。那时候预科中受了教会学校的影响,完全偏重英语及体育两方面;其他科学比较的落后,毕业后若直升本科,发生困难。预科中竟自设了一个预科大学的名义,信笺上亦写此等字样。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预科直接受本科学长的管理,不再设预科学长。预科中主要的教课,均由本科教员兼任。

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限,常为之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学亦有工、法两科。北京又有一工业专门学校,都是国立的。我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办。得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与矿冶工并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来的经费,用在理科上。我本来想把法科与法专并成一科,专授法律,但是没有成功。我觉得那时候的商科,毫无设备,仅有一种普通商业学教课,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学生毕业后停止。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决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

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然没有达到目的。

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民元在教育部宣传教育方针时说他不合用了。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反对。适有赵体孟君以编印明遗老刘应秋先生遗集,贻我一函,属约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诸君品题。我为分别发函后,林君复函,列举彼对于北大怀疑诸点;我复一函,与他辩。这两函颇可窥见那时候两种不同的见解,所以抄在下面。^①

这两函虽仅为文化一方面之攻击与辩护,然北大已成为众矢之的,是无可疑了。越四十余日,而有五四运动。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他们因愤激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喧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

^① 两函此处略。

九日。

那时候学生仍每日分队出去演讲，政府逐队逮捕，因人数太多，就把学生都监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学生受了这样的压迫，于是引起全国学生的罢课，而且引起各大都会工商界的同情与公愤，将以罢工、罢市为同样之要求。政府知势不可侮，乃释放被逮诸生，决定不签和约，罢免曹、陆、章，于是五四运动之目的完全达到了。

五四运动之目的既达，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复，独北大因校长辞职问题，又起了多少纠纷。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继任，而为学生所反对，不能到校；各方面都要我复职。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劳而无功的生活。所以启事上有“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汽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等语。但是隔了几个月，校中的纠纷，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决的状态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发表一文，告北京大学学生及全国学生联合会，告以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到校后，在全体学生欢迎会演说，说明德国大学学长、校长均每年一换，由教授会公举；校长且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之教授轮值；从未生过纠纷，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绩。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

那时候蒋梦麟君已允来北大共事，请他通盘计划，设立教务、总务两处及聘任财务等委员会，均以教授为委员。请蒋君任总务长，而顾孟余君任教务长。

北大关于文学、哲学等学系，本来有若干基本教员，自从胡适之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所以兴会较高一点。预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国学四种研究所，止有国学研究所先办起来了。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比较的困难一点。自民国九年起，自然科学诸系，请到了丁巽甫、颜任光、李润章诸君主持物理系，李仲揆君主持地质系。在化学系本有王抚五、陈聘丞、丁庶为诸君，而这时候又增聘程寰西、石蘅青诸君。在生物学系本已有钟宪鬯在东南西南各省搜罗动植物标本，有李石曾君讲授学理，而这时候又增聘谭仲逵君。于是整理各系的实验室与图书室，使学生在教员指导之下，切实用功；改造第二院礼堂与庭园，使合于讲演之用。